

华语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与思考^①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关键词] 华语; 华语研究; 方法论

[摘要] 华语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方兴未艾, 发展空间巨大, 是全球华语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方面。文章举例性地分析了华语研究中已有的方法论探索, 如深度对比与微观对比研究, “古、方、普、外”四个视角以及“历时—共时”“书面语—口语”“共同语—方言”三维框架; 在接下来的“思考”部分, 从对已有探索不断补充和完善, 以及进行更大范围和规模的方法论创新建设两个方面, 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和阐述。

[中图分类号] H19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174 (2022) 03-0001-08

DOI:10.16131/j.cnki.cn44-1669/g4.2022.03.007

1. 引言

华语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方兴未艾, 发展空间巨大, 是全球华语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方面。祝晓宏(2016)曾经举例性地谈及以下几项在华语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探索及认识:

其一, 将“华语视角”引入微观层面, 提出华语不仅是一个概念或研究对象, 也可以是一个研究视角, 即从全球华语的视野来看待包括普通话在内的各地华语(祝晓宏, 2011);

其二, 提出在多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性考察的语法研究思路(储泽祥, 2011);

其三, 提出“直接对比”概念, 即有意识、有目的地选取能够形成直接对比的语料(如同一英文原著“Steve Jobs”的海峡两岸译本), 并以此为基础而进行的“非间接性”对比研究(刁晏斌, 2015a)。

以上讨论极具眼光, 但是尚不充分,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华语研究的不断拓展与加深, 方法论的探索也时有创获, 早已超出上述范围, 因此非常值得而且应该作进一步的、“即时性”的总结; 另外, 也还应该进一步向前看, 就此作出更多的思考, 进而作出更大的努力。

在一般的具體研究中, 人们经常用“华语”来指称全球华语或大华语中与普通话相对(或称“非普通话”)的部分, 这已经成为比较通行的做法(刁晏斌, 2018: 2-27)。本文所用“华语”也是如此, 即指普通话以外的全世界华人共同语。

2. 华语研究方法论探索举例

我们对华语研究方法论探索的讨论, 大致有以下几个立足点:

第一, 立足于华语“本体”研究。周清海(2014)指出, 华语“无论是书面语或者是口语, 还有许多地方没弄清楚”, 而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这些部分(引者按, 指上文提到的华语出现的许多特点)我们以前都关心得不够, 研究也做得不多”(周清海, 2015)。正因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一段时间以来, 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整个华语研究中最集中、成果最多的部分; 另一方面也是最需要更具适用性和有效性的方法论指导的部分之一。

第二, 立足于创新性与针对性。创新性是针对已有而言, 即与“传统”方法有明显不同, 此前从未在华语研究中完整使用的、带有

[收稿日期] 2022-01-21

[作者简介] 刁晏斌, 男,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现代汉语史、全球华语对比研究。电子邮箱: diaoyanbin@sina.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华语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1FYYB055)

明显创新意识与特点的认识及理论框架等；针对性则是面向华语独特的事实及其特点，而专门设计的更具适用性的操作模式等，并且已有一定的研究实绩，初步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第三，立足于“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方法”。按我们的理解，所谓“方法论”，应该是超脱某一具体“方法”的理论框架及由此衍生的具体操作模式，因而属于“理论”层面而不是“技术”层面，属于某一学科或领域内的理论建设。

随着华语研究的日益拓展与深入，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具有以上三方面特征的探索性成果问世，代表了华语理论建设的新进展，同时也对华语本体研究起到实质性的推动。具体而言，这样的成果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一是在具体现象的归纳、事实的分析等具体操作过程中尝试使用以前未见或较少使用的方法，能给人们带来新的启发、新的认识，而这样的方法在一定甚至很大程度上具有广泛适用性和可类推性，我们所见以这种类型居多，如邵敬敏、刘杰（2008），郭熙（2012）；二是直接以方法论为探索对象，直接给出适用于某一或某些方面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操作模式等，这样的成果目前还不多见，但是更具理论色彩、意义和价值，如王晓梅（2019、2020）等。以下，我们就围绕上述两个方面对华语研究方法论的探索进行举例说明。

邵敬敏、刘杰（2008）以“手机”一词为例，调查与分析了不同华语社区同义词群的竞争与选择问题，其中就有比较深厚的方法论色彩。比如，文中利用 Google 在 2007 年 10 月以及 2008 年 3 月两次对“手机”及其同义词群进行搜索，并作了两方面的比较：一是跟 CCL 语料库的数据对比，二是 Google 前后半年数据之间的对比，由此显示出同义词群中各词使用量的消长变体。此外，该文还根据邹嘉彦、游汝杰《21 世纪华语新词语词典》（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的“手机同义词群”图表，整理出一张关于新词“手机”的发展线索对比图表，由此显示“手机”一词的崛起并最后胜出有其重要的语言原因以及深刻的社会原因。此外，文中还用同样的方法调查了各地华语“互联网”等名称的竞争与选择，还指出这一方法也

可以用之于外来词的引进方面。我们在讨论现代汉语史的研究方法时，提出“网络调查法”（刁晏斌，2006：87-89），而本文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并且与已有相关研究（调查结果）相结合，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调查的范围和内涵。不同语言形式的竞争与选择在华语中是一项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研究课题，因此本文的方法既值得借鉴，更应该推广。

刁晏斌（2017a）专设“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对比研究新视角”一章，这里的“新视角”很大程度上就是着眼并立足于方法论的。其下分为四节，分别是“深度对比”研究、“直接对比”研究、“微观对比”研究和“计算对比”研究。以上四部分内容，前引祝晓宏（2016）已经简单提及“直接对比”研究，而我们在下文还要谈及“计算对比”研究；剩下的两项，具有内在的联系，所以可以放在一起作简单的介绍。

所谓深度对比以及深度对比研究，就是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加深，寻求新的增长点，从而无论在局部还是整体上都达到一般本体语言研究所追求的三大目标：对各地华语及其与普通话的差异以及发展变化等事实进行充分的观察、描写和解释。具体的目标与追求则是“以小观大”，由既是词汇单位又是语法单位的微观个体——一个个具体的“词”入手，通过对其意义和用法等进行尽可能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来了解和把握两岸共同语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再深入一步，就是“微观对比”研究：把“触角”下探和内移，深入到词的内部，从更加微观的角度着眼和入手，即在“语素”和“义素”层面，进行不同对象之间的对比考察，我们称之为“语素/义素本位”（刁晏斌，2016a）。例如，马来西亚华语中，以“礼”为语素构成的词特别多，如“动土礼、挥旗礼”等，而这些词普通话中基本没有，由此体现了二者在简缩性语素选择及使用上的不同取向。如果从这一点入手，一方面可以由词的比较进入词族的比较，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语素层面进一步发掘二者之间的差异（如“礼”与“式”二者之间的对应与不对应及其消长变化等）。再如，普通话中，“乡亲”一词具有 [+称呼] [+农村人] 的义素/语义特征，而在马来西亚华语中，具体使用中的“乡亲”

经常是[-称呼][-农村人]的，它一般只用于具有[+指人][+亲切]语义特征的指称形式，而这就是两地之间词汇在义素（即语义特征）层面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属于李行健（2013）所说的与“显性”差异相对的“隐性”差异，是微观对比研究的重要着力点。这方面的深入发掘，一方面能够反映华语真实的内涵及准确的实时使用状况，另一方面也能够总结、提升为理性认识，如隐性差异词包括哪些方面的哪些种类，其形成的原因及可能的发展路径是什么，其间有什么普遍或独特的内涵，应该确立什么样的发现程序和工作模式，由此可以给词义以及词义对比研究带来哪些新知等（刁晏斌，2020a）。

20世纪后期，中国学者的理论意识空前增强，随之而来的是一些立足汉语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不断问世，邢福义先生提出的“两个三角”理论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华语研究中，有人利用“大三角”理论与操作模式来分析和解释其独特的现象，取得不错的效果。比如，李计伟（2012）借此分析马来西亚华语的两种语法结构即“介词+X+起见”和“以策+X”，从“小三角”（表-里-值）和“大三角”（普-方-古）两个方面，分析说明两种句式与普通话的差异，以及与南方方言和古汉语语法的密切关系，由此在共时与历时两个层面对上两种句式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描写、分析与解释。文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两个三角”理论和模式是发掘海外华语语法特点的根本方法。在我们看来，这是把本土原创方法论用于华语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

在这样的尝试基础上，王晓梅（2018）结合马来西亚华语实际，以“大三角”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古、方、普、外”四个研究视角，其中“古”指的是古代汉语（包括近代汉语）对马来西亚华语的影响，“方”指的是闽、粤、客等南方方言的影响，“普”指的是普通话即当地华语与普通话的异同，“外”指的是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等的影响。文中分别从上述四个方面对一些语言现象进行了分析及探源等，显示了建立“古、方、普、外”四个视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王文认为，进行华语研究应该充分考虑这四个视角，并用于解

释各地华语特征的结构特点与形成原因；另外，这一理论视角不仅适用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同时也适用于新加坡、印尼等华人人口众多、华语变体自成一格的区域，这样就具有了跨社区的更广泛的适用性，自然也就具有了更大的意义和价值。

几乎与此同时，香港学者田小琳（2018）主要立足于香港言语社区，也提出了“普-方-古-外”四个视角。另外，田小琳（2019）还把“普-方-古-外”上升到“比较原则”的高度，用于讨论香港社区词与方言词、文言词、外来词的关系，以及分析香港社区词构词的修辞特点。田文得出的结论是，用普通话语素构词，令香港社区词具有通用性；吸收少数粤方言词，令香港社区词具有本地色彩；吸收古汉语语素构词及文言词，令香港社区词具有传统性；吸收外来词和组造字母词，令香港社区词具有开放性。

以上王、田二人可谓不谋而合，只是前者立足于东南亚华语研究，而后者立足于香港语言教学及研究，另外四角的顺序也不相同，反映了同中之异。

关于上述“四个视角”观的贡献，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结合华语实际，对立足于汉语普通话而提出的“大三角”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拓展，从而为华语分析提供了一种更具全面适用性的思想观念与操作模式；

其二，相对于“大三角”理论主要着眼于并用之于语法研究，“四个视角”的提出者强调它可以用于词汇、语音、语法以及修辞等的研究，这样，它就具有了更大的使用和适用范围，同时也具有了更大的意义和价值；

其三，王文明确指出，把四个视角作为“分析马来西亚华语乃至全球华语的理论框架”，其目的在于“引发学界对全球华语理论的探讨和交流，推动全球华语或大华语理论建设的进程”，也就是说，它首先是着眼于华语研究的理论建设。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认为四个视角不但具有浓厚的方法论色彩，同时也因其具有极大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而在华语研究中大有所用武之地，循此以往，必将带来华语研究质量和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继四个视角之后,王晓梅(2020)又提出了一个华语语法分析的“三维框架”,即从“历时—共时”“书面语—口语”“共同语—方言”三个维度分析华语语法现象,并且强调三者之间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的。这样,四个视角和三维框架合在一起,就基本构成了一个华语分析的立体网络,同时也成为全球华语学方法论探索的一项集成性成果。

此外,华语研究中还有一项内容持续时间很长、研究成果很多,同时也极富理论色彩,就是“社区词”,其在方法论层面也非常值得总结,因笔者另有专文对此进行讨论(刁晏斌,2022),所以此处暂付阙如。

3. 关于华语研究方法论建设的思考

在华语研究中,我们一直秉持这样一个信念: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华语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已有理论的应用地与验证场,同时也是新理论的“孵化器”(刁晏斌,2020a)。这里的新理论当然也包括新的方法论。

方法论建设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已有华语研究多是沿用语言本体研究的“现成”方法,方法论的创新不足,由此实际上已经造成一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比如对一些现象的考察与分析比较简单化,缺乏应有的全面与深入等(刁晏斌,2016b)。

为了改变上述现状,我们大致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加大投入,争取更多的产出、更大的收获。

3.1 对已有探索不断补充和完善

某一方法论的探索可能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不同学者的“接力”传递,才有可能达到比较完善的境地,并在不断地创造性使用中发挥更大的效益。比如以上讨论的四个视角,大致就是如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四个视角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即中国早期国语的视角。另外,按现有认识,华语属于传承语/祖语,而它的传承对象或称“原祖语”就是早期国语(刁晏斌、周连英,2021),所以这一视角也可以称为“传承语视角”或“祖语视角”。我们建议增加这一视角的理由大致如下:

其一,最初的华语(即东南亚华语)是由中国大陆地区的早期国语即当时的汉民族共同

语“整体移植”而形成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曾经作过比较全面的阐述与证明(刁晏斌,2018:145-182)。正因为如此,当今各地华语与早期国语保持了很高程度的一致性,这一点已经为很多研究成果所证明,比如郭诗玲、高虹(2016),王彩云(2016),李计伟、张翠玲(2019)等。所以,早期国语应该是观察华语的一个重要视角,二者之间关系的对比与参照理应成为华语研究的“常规”内容之一。

其二,普通话视角不能替代早期国语视角。按现在的认识,普通话与早期国语是变体与本体的关系,前者难以包括或涵盖后者,所以只提前者而忽略后者,必然会留下一个不小的空缺,造成观察与研究的“盲区”。当然,我们这样说,并非否定普通话作为四个视角之一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相反,华语与普通话因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发展的速度不同,所以产生较大差异,而这也决定了二者有充足理由成为相互比较的对象。

其三,在实践层面,在某些具体现象的研究中,由于早期国语视角的缺失,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某些结论的全面性甚至于正确性。比如,许多相关研究以华语与普通话的差异为立足点,其中有一些就把前者表述为后者的“变体”,把华语与普通话的不同称之为“变异”,这实际上是认错了对象。再如,华语研究一度有重共时、轻历时的倾向,其中的表现之一是短于或疏于溯源,而这个“源”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早期国语。所以,无论着眼于华语的共时还是历时研究,早期国语都是不可或缺的观察角度和研究内容。

其四,旁观其他方面的研究,比如在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中,就有学者提出了“‘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唐贤清、姜礼立、王巧明,2019)。这里的“普方古民外”就是考察汉语历史语法现象的五个视角,比上述四个视角多出了一个“民族语言”,这无疑是根据研究对象特点而对邢福义先生“大三角”理论所作的补充和完善。关于建立“民”角的理由,文中指出,“汉语与其亲属语言之间的关系,使得民族语言能为汉语的历史研究提供大量的、有价值的线索和旁证,也能为构拟原始汉藏语和揭示汉藏语历史演变规律提供证据。”

“我们通过参照民族语言，可以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提供有力的证据和更加合理的解释。”这里的“线索”“有力的证据”与“合理的解释”，也同样能够由早期国语提供给当下的华语研究。

基于以上四点理由，我们认为，华语的观察与研究视角，可以而且应该由四到五，从而具有更大的覆盖面，并且能够对华语进行更多方面、更多角度的观察与分析。

确立了视角的数量，接下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各视角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权重”，这也是一个极富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的问题。比如，相对于其他各角，“古”角或许只是一个“半角”，因为华语中的古代成分虽然不少，但基本都是来自早期国语或方言，而非直接进入，因此不宜跟其他视角等量齐观。其实，确立研究视角的目的，是为了全面、深入、细致地观察研究对象，随着华语研究以及相关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或许可以找到更多的观察角度，甚至还有可能在一个角度之下再分出多个下位的角度或方面。比如，“外（语）”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一是在不同的言语社区起重要影响作用的外语并不相同，二是在同一个言语社区可能同时存在几种对华语具有重要影响的外语（比如马来西亚的英语和马来语），而这就使得进一步的区分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外”角之外，“方”角大致也是如此。这里涉及的问题比较多，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讨论。

3.2 进行更大范围和规模的方法论创新建设

华语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为方法论的探究与创新提供了一个大平台，这方面的开掘空间确实很大。进行华语研究方法论的建设与开拓，大致有以下两个立足点以及目标指向：一是着眼于华语构成以及对其产生较大或很大影响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二是因应华语研究的实际需要，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探求更具针对性和适用性的独特方法。上文讨论的“视角”和“框架”基本属于前者，而以下主要立足于后者进行举例说明。

比如，基于语料库的统计方法在当下已经广为人知，使用该方法的研究成果也已相当多见，以下几项研究虽然也归属于此，但却各不相同。

陈瑞端、汤志祥（1999）以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汉语词库”的六百万字语料为基础，通过检索和统计，对上世纪90年代通行于整个汉语·汉文化区域的汉语词汇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着重考察当代汉语词汇的“共同底层”和三个区域之间的“地域差异”，从数量特点及其分布角度，对流通于整个汉语区域的“基本词汇集”和仅在各自区域或者其中两个区域之间流通的“子词汇集”作了一个初步的定性分析。如果说，这种仅以“数量和比例”为调查对象的统计分析还属于比较“基本”的计算分析的话，那么以下各篇的具体路径及方法等则又有所不同。

邓思颖（2018）提出了“参数分析法”，通过时代、地域、方言、语体这四项参数来描述华语的变体，指出这四项参数为全球华语变体的分类提供了清晰而可操作的划分标准，它以动态的方式窥探全球华语变体的互动关系，希望在建构全球华语研究的理论路程中踏出一小步。文章认为，日后还可以此为其他研究的基础，如语言类型学、形式句法学等，在本体研究的层面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谢永芳、张湘君（2015）与上文有些类似，但是更加偏重计算与测量。文章引进社会科学“指标体系”研究模式，甄选了三级共10项指标，采取客观、主观两种赋值计算法，比较测量华语手机类异称词语的结构，用数据位次显示差异，并借助数据对词语结构在华语社区异称选择竞争中的制约作用进行解析。文章指出，采用“指标体系”有助于词语比较的精细全面与准确可信，有助于开启测量式比较和数据式解析华语社区差异词的新尝试，促进相关研究在指标数据时代的深化和拓展。

与以上二文有所不同，刁晏斌、邹贞（2014）则是就单一指标及数据，使用独创的计算公式进行对比分析。文章在分析海峡两岸女性译名性别义溢出情况差异时提出“女性

① 翻译中源语和译入语双方在意义上存在不对等现象，其中译入语词在意义上多于源语言的语词，就叫“义溢出”。译名中的义溢出主要体现在姓名、性别、褒贬等方面，其中最显著的便是性别义溢出。见潘文国（2002）。

度”概念^①，以12万多个大陆人名作为调查对象，用计算方法得出女名用字的女性化色彩强弱（即女性度）数值，并以此为依据对两岸女性译名的性别义溢出情况进行量化比较、分析，最终结论是台湾女性译名的整体女性度以及个体译名女性度普遍高于大陆译名。

以上几篇文章中的计算以及与之相关的分析各有侧重，具体方法也有差异，可以简单概括为“参数分析”“指标分析”和“计算分析”，如果合而观之，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归纳与概括，则或可初步建构华语研究“统计分析”方法论的部分内容。在当下基于语料库甚至大数据的华语研究中，这是一种前景广阔的研究方法，具有极大的理论开拓空间和实际应用前景。

再如，刁晏斌（2020b）由海峡两岸语言的“历史差异”与“现实差异”入手，提出了海峡两岸语言差异研究的历时观问题。“历史差异”是指“过去”既已存在的差异，而“现实差异”则是指当下现实存在的差异，在两岸语言由差异走向融合的条件和背景下，二者的内涵、范围等并不相同，而这正是两岸语言及其关系的历时发展所致。由此得出的认识是，两岸语言差异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实时过程，而二者的融合是造成其不同阶段实际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当下不少两岸差异对比研究主要基于工具书或其他一些“后时”语料，因此不能与语言应用的实际同步，由此造成不少研究结果“失实”“失真”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刁晏斌（2016b）提出了“即时性研究”主张，认为在一个词语产生时间可以精确地追溯到某一秒的时代（我们称之为“秒时代”），即时性语料的使用以及基于这样的语料所作的语言实时状况的即时性研究应该是应有之义。特别是语言现象的融合，有时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也不为过，它不断造成已有差异的消减，^①所以更应强调这种即时性。由即时性的研究，牵引出两种不同的研究模式：一种是“开始做”，即完全或主要依据一些即时语料来进行差异与融合的对比研究，这样才能反映某一现象本身及两岸之间对比的最新实时状况；另一种是“接着做”，即针对某些已有

研究作进一步的后续跟踪调研，补上从当时到当下这一段时间的空缺，从而形成一个时间上有连续性、内容上有延展性的完整研究。

上述“历史差异”与“现实差异”在华语各子社区之间普遍存在，所以即时性研究以及“开始做”与“接着做”也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比如就普通话与华语的对比而言，按周清海（2017）的认识与表述，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界，经过了“分裂时期”与“融合时期”这样两个阶段，历史差异主要指在分裂期产生并存在的差异，而现实差异则是进入融合期以后不同时间点上的差异，二者在范围上有大小之别，在项目上也有多少之别，此外应该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区别。

仅仅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就能够看到，在华语研究中，开阔思路，进行更大规模的方法论创新建设正当其时，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追求。比如，周清海（2020）谈到，现有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新加坡华语“有”而普通话“没有”的语法现象，却忽略了普通话“有”而新加坡华语“没有”的语法现象；郭熙（2018）也就此指出：“语法的全面描写还没有展开。这里提及语法的‘全面描写’，是因为以往强调描写各地的语法特点，而由于研究者多是中国学者，缺乏赵元任（1979）所说的土著感，容易出现重视‘我无他有’、忽视‘我有他无’的情况，也不利于编写教学参考语法。”由此给我们的启发是：立足于华语，上述“无”的现象自然应该充分重视并进行研究，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应该怎样研究？而这无疑会给我们的华语研究方法建设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4. 结语

周清海（2021）认为，华人有共同的语言，是一笔财富，一笔应该继续爱护和保留的财富，而李宇明（2021）的一段话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财富说”给出了解释：“这种由内地到港澳台地区、由本土到海外、由母语到二语（甚至三语），由一隅到全球的视域扩展，使得观察汉语的参照系也在发生改变，涉

^① 另一方面，在现实的语言生活中不同华语区也还会不断有新的差异产生，所以实际的情况是有减有增。

及的语言现象、语言关系、语言问题也空前繁多复杂。”我们也在5年前就从另外的角度指出：“两岸四地当下的民族共同语合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共时平面，所有现象和用法的总合构成了当代“大汉语”的共时全貌，这一全貌远比任何一地汉语的单一面貌更为复杂多样、丰富多彩，在形式和内涵上都达到了一个包罗四地的‘最大值’，不仅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观察角度和研究内容，而且也更多理论、方法的运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现实需求。”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这“是上天对所有汉语/华语研究者的一份厚赐，不仅应该充分尊重和珍惜，更应该充分开发和利用，从而出成果、出方法、出理论”（刁晏斌，2016b）。

本文对华语研究方法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内容包括已有认识、可能存在的不足以及进一步探索的思考，这样的内容安排或许正可以反映全球华语学这一新兴领域理论探索的前进路径：在创新中提高，在发展中完善。

最后，我们回归问题的本原：进行华语研究方法论探索的根本目的和归宿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大致归纳为“器”和“道”两个层面，以下简要说明。

4.1 “器”的层面

器之目的在于用。华语研究方法论探索来自对华语的实际研究，而反过来又能指导和促进后者，使之更上一层楼。具体而言，大致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用之于华语研究。比如上文讨论的华语研究五个视角，还有一点没有谈及：“第五视角”即“国”角的提出，是基于“以传统国语为基础的华人共同语”这一华语观^①，在这样的华语观下，自然就会意识到还应该再有一个“国”角，并且还应该是一个比其他各角更加重要的视角，因为其他各角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发挥作用或产生影响的。随着“国”角的加入，必然会给华语研究带来新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共时研究引向历时，并最终达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过初步的讨论与尝试（刁晏斌，2020a；

2021），得出了能够完全支持上述认识的结论。

其二，用之于普通话研究。我们曾经著文讨论普通话研究的国语/华语视角问题（刁晏斌，2019），认为建立国语/华语视角，在共时方面有助于对普通话基本面貌及特点的了解与认识，以及研究范围的拓展、深化与细化；在历时方面，有助于理清百年汉语的发展线索，以及具体现象的历时研究，从而进一步明晰普通话形成及发展的过程。比如，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大三角也可以比照华语“五角”相应地增加外语、台港澳国语以及海外华语视角，这样就成了“普、方、古、外、国/华”。就增加的两角而言，普通话中包含大量的外来因素，论者常以“欧化”“日化”称之，所以“外”角内涵丰富；“国/华”角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普通话深受台港澳国语及海外华语的影响，产生很大变化，所以这个视角也具有其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4.2 “道”的层面

这里指的是“纯理论”的建设与追求。几年前，我们立足于华语研究，倡导与呼吁建立“全球华语学”（刁晏斌，2017b），其目的是一是突出其理论性，二是彰显其学科性，就其具体诉求而言，则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建立全球华语的理论体系。要想成为一门学问，而不仅仅是一项研究或一个研究领域，自然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具体而言，其来源有三：一是采取“拿来主义”，借鉴国内外已有理论，用之于具体的研究实践；二是结合华语实际对所用理论进行调整、修改、补充及完善，使之更加适合华语实际；三是产出原创性的理论。以上三个方面，大致也构成了华语理论（包括方法论）建设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

其二，为普通语言学作出贡献。全球华语具有跨越时空、超越族群的特征，因而不仅具有事实发掘的巨大空间，同时也具有理论提炼的丰富内涵，由这一研究，理应为世界普通语言学作出其独特的贡献，这是华语研究者应有的担当和自觉，也是其理论探索与追求的更高境界。

^① 李宇明（2014）给出的华语定义是“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刁晏斌（2015b）给出的则是“以传统国语为基础、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二者都强调了早期国语与华语的密切关系。

〔参考文献〕

- 陈瑞端,汤志祥 1999 九十年代汉语词汇地域分布的定量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4).
- 储泽祥 2011 在多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性考察的语法研究思路[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 邓思颖 2018 全球华语词汇研究的参数分析——以“点算”为例[J]. 汉语学报(4).
- 刁晏斌 2006 现代汉语史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5a 试论两岸语言“直接对比”研究[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 2015b 论全球华语的基础与内涵[J]. Global Chinese(全球华语)(1).
- 2016a 再论海峡两岸语言微观对比研究[J]. 文化学刊(1).
- 2016b 关于进一步深化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的思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 2017a 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对比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17b 试论建立“全球华语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J]. 语言战略研究(2).
- 2018 全球华语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M]. 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 2019 论普通话研究的国语/华语视角[J]. 华文教学与研究(2).
- 2020a 论全球华语研究的拓展与加深[J]. 华文教学与研究(1).
- 2020b 海峡两岸语言差异研究的历时观[J]. 汉语学报(5).
- 2021 东南亚华语初期发展变化考察[J]. Global Chinese(全球华语)(1).
- 2022 社区词理论:已有进展及进一步研究的思考[J]. 语文研究(2).
- 刁晏斌,邹贞 2014 基于计算的海峡两岸女性译名性别义溢出情况对比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 刁晏斌,周连英 2021 论华语“三观”[J]. 励耘语言学刊(总35).
- 郭诗玲,高虹 2016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华语环境概貌:历史与现状[J]. 台湾东南亚学刊(2).
- 郭熙 2012 华语视角下的“讲话”类词群考察[J]. 语言文字应用(4).
- 2018 全球华语背景下的语言规划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2).
- 李计伟 2012 “两个三角”理论与海外华语语法特点的发掘[J]. 汉语学报(3).
- 李计伟,张翠玲 2019 传承语的保守性与东南亚华语特征[J]. 华文教学与研究(3).
- 李行健 2013 两岸差异词再认识[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
- 李宇明 2014 汉语的层级变化[J]. 中国语文(6).
- 2021 世界汉语与汉语世界[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
- 潘文国 2002 汉语音译词中的“义溢出”现象[A]. 载潘文国编.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4[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574-597.
- 邵敬敏,刘杰 2008 从“手机”看不同华语社区同义词群的竞争与选择[J]. 语文研究(4).
- 唐贤清,姜礼立,王巧明 2019 汉语历史语法的“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J]. 古汉语研究(4).
- 田小琳 2018 “普-方-古-外”的比较原则在现代汉语词汇教学中之应用[R]. 全国高校现代汉语教学研究会第十六届学术研讨会论文.
- 2019 香港社区词的修辞特点[A]. 载胡范铸,王建华编. 中国修辞2018[C]. 上海:学林出版社:86-90.
- 王彩云 2016 从虚词变异看马来西亚华语与早期现代汉语的关系[J]. Global Chinese(全球华语)(2).
- 王晓梅 2019 “古、方、普、外”——论全球华语研究的四个视角[J]. Global Chinese(全球华语)(1).
- 2020 马来西亚华语语法的三维分析框架——以有标差比句为例[J]. 华文教学与研究(2).
- 谢永芳,张湘君 2015 华语社区同实异称的比较与测量[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 周清海 2014 华语教学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5).
- 2015 汉语融合时代的语言研究与语料库[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总25).
- 2017 “大华语”与语言研究[J]. 汉语学报(2).
- 2020 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的结项报告[A]. 载周清海编. 汉语融合与华文教学[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65-71.
- 2021 从“大华语”的角度谈语言融合、语文政治化与语文教学[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
- 祝晓宏 2011 华语视角下“插”类词的语义变异、变化及传播[J]. 语言文字应用(2).
- 2016 近十年来华语研究的理论探索与应用进展[J]. 语言学研究(1).

(下转第67页)

Evaluating online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apps on the basis of Lew & Szarowska's (2017) Evaluation Framework

LI Rui¹, WANG Yanjun²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20, China;

2.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10, China)

Key words: dictionary apps; Lew & Szarowska's (2017) Evaluation Framework;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dictionary evaluation

Abstract: Dictionary apps have become the mainstream dictionary form used by language learners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continuous launch of new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ies, the quality of dictionary app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Chinese learners' learning effect. It is regrettable that at present, there is no evaluating research on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apps in China, and there is a lack of a standardized evaluation system. The article aims to introduce Lew & Szarowska's (2017) Evaluation Framework and modifies it according to the properties of Chinese.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this article evaluates the three most popular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app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revised framework is proved to be suitable for the evaluation of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apps; (2) 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apps varies, and the overall quality is not satisfactory; (3)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apps face many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ng results, some suggestions are presented for compiling the three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apps.

【责任编辑 刘文辉】

(上接第8页)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on Huayu research methodology

DIAO Yanb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Key words: Huayu; Huayu research; methodology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f Huayu (Overseas Chinese) research methodology is in the ascendant and has a huge space for development, and i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global Huayu lingu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 in Huayu research, such as in-depth comparative and micro comparative research, the four perspectives of "ancient Chinese, Chinese dialects, putonghua (standard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diachrony-synchrony", "written language-spoken language" and "common language-dialects"; In the following "reflection" part, this paper makes a specific discussion and elaboration from two aspects: continuously supplementing and perfecting the existing exploration, and carrying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methodology innovation in a larger scope and scale.

【责任编辑 刘文辉】